

DOI: 10.12046/j.issn.1000-5285.2018.01.017

情绪劳动对特殊教育教师心理健康的影响：基于调节性中介模型的实证分析

张冉¹, 叶超²

(1. 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 上海 200062;

2.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 上海 201620)

摘要: 以 158 名特殊教育教师为被试, 采用纵向研究方法并通过一个二阶段调节的中介模型建构, 探讨了基于自我和他人关注双层面情绪劳动(表层扮演和情绪增强)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 (1) 情绪劳动正向预测了工作对家庭产生冲突; (2) 工作对家庭冲突在情绪劳动和心理健康间起完全中介; (3) 核心自我评价缓解着工作对家庭冲突对心理健康的直接影响, 以及情绪劳动通过工作对家庭冲突对心理健康的间接影响。

关键词: 特殊教育教师; 情绪劳动; 工作对家庭冲突; 心理健康; 核心自我评价

中图分类号: B84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277(2018)01-0146-08

一、问题的提出

从全纳教育角度看, 我国特殊教育教师是以特殊需要学生^①为教育对象的专业人员, 他们面对着数量庞大且繁杂的教育对象, 包括残疾儿童、天才儿童、流浪儿童、留守儿童、文化或种族属于少数群体的学生, 以及来自其他不利处境的学生。总体上, 特殊教育教师在保障我国特殊需要学生受教育权利和促进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中具有积极的作用。为此,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 要加强特殊教育师资队伍建设。2017年2月新修订的《残疾人教育条例》也强调, 重视特殊教育教师的培养。然而, 当前我国特殊教育教师面临着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相关研究表明, 我国特殊教育教师心理健康水平整体较低^②, 心理问题检出率远高于普通中小学教师^③。心理健康状况不仅会影响特殊教育教师教学工作活动的正常开展, 也会对受教对象的心理健康产生直接负面影响。因此, 近些年特殊教育教师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已逐渐成为理论界和教育实践部门关注的热点。

收稿日期: 2017-09-07

基金项目: 2017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编号: 2017ECNU-HWFW037)。

作者简介: 张冉, 男, 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教授, 管理学博士, 研究方向: 员工行为与心理健康、社会组织管理;

叶超, 男,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讲师, 管理学博士, 研究方向: 公共服务人员行为与心理健康。

① 根据 1994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的世界特殊教育大会通过的《萨拉曼宣言》和《特殊需要教育行动纲领》, 特殊需要学生泛指“一切身体的、智力的、社会的、情感的、语言的或其他任何特殊教育需要的儿童和青年”。

② 周玉衡、刘晓燕《山东省特殊教育教师心理健康状况调查研究》, 《中国特殊教育》2013 年第 1 期。

③ 徐美贞《特殊教育教师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研究》, 《中国特殊教育》2004 年第 2 期。

作为一类新型的工作压力源,情绪劳动(emotional labor)是一种要求个体产生或压制某种情感、维持外部表情从而给他人带来适宜性心理状态的一种劳动形态^①,其主要伴随服务业迅猛发展而出现,并普遍存在于与人接触频繁的一线服务性职业人群(如护士、空乘人员等)之中。同样,直接面对并给特殊需要学生提供教育服务的特殊教育教师在工作中也需要付出相应的情绪劳动。在教育教学中,特殊教育教师不仅要付出体力与脑力劳动,还要按教育工作要求呈现出适当的情绪,如表现为对受教儿童的热情、鼓励并使他们增强自信心等。与此同时,特教教育面向的人群多为情绪不稳定和生性敏感的儿童,这需要教师们在工作中付出大量的心智努力和爱心。相比较普通教育教师,特殊教育教师往往付出更多的情绪劳动^②。可以说,情绪劳动已经成为当前特殊教育教师重要的劳动形态。根据Pugliesi的观点,情绪劳动生发于自我和他人关注两个层面^③。自我关注强调个体对自我情绪进行调整和管理。例如,未实际感受到某种情感(如快乐)却要呈现出所对应的情绪(如微笑)的表层扮演(surface acting),以及能在内心真实感受到某种需要的情绪的深层扮演(deep acting),均是此类情绪劳动的代表;他人关注则强调个体为改变他人情绪(包括正向或负向情绪)所付出的努力。其中,使他人产生正向情绪(如快乐)而付出的努力又称为情绪增强(emotional enhancement)。在自我关注的情绪劳动层面,相比较深层扮演,表层扮演对劳动付出者的心理健康破坏性更大。与此同时,特殊教育教师在教育教学工作中还使学生们产生正向情绪如自信、自尊和快乐等,即付出较多的他人关注的情绪劳动。因此,本研究主要从自我关注的表层扮演和他人关注的情绪增强这两个层面来研究特殊教育教师情绪劳动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机理。当前,国内外少数学者对情绪劳动与心理健康的直接关系进行了研究,但缺乏基于相关中介变量的影响机理探索,且尚无就特殊教育教师展开针对性研究。

Koeske和Koeske^④的“压力源-紧张-结果”模型(Stressor-Strain-Outcome,简称S-S-O)为我们理解情绪劳动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机理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分析框架。S-S-O模型是管理心理学领域中压力源影响机理的一个经典分析工具,其主要用来阐释个体所遭受的压力(即自变量)通过何种影响路径(即中介效用)来对其心理和行为(即结果变量)产生影响。在S-S-O模型中,压力源常被视为一种艰困且具挑战性的客观存在;并且,压力源(如工作压力)将导致紧张(如生理或心理紧张),而紧张产生结果(如态度或行为结果)。例如,Cheung和Cheung指出,工作紧张来自于工作压力源,而这种工作紧张将给人们的注意力、心理和情感等方面带来破坏性的影响^⑤。对于特殊教育教师而言,情绪劳动就是面向受教对象在施教过程中所付出的一种挑战性劳动,可以被视为一种人际层面的压力源。为此,基于S-S-O模型应用,我们认为,情绪劳动(即压力源)将带来某种紧张,从而间接影响心理健康(即结果)。作为一种工作关联性紧张,工作-家庭冲突(work-family conflict)被定义为“来自工作和家庭领域角色压力互不相容的一种形式”^⑥,并分为工作对家庭冲突(work-to-family conflict)和家庭对工作冲突(family-to-work conflict)两类^⑦。其中,前者多生发于工作领域的

① Hochschild, A. R. *The managed heart: 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 feel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5-7.

② 周厚余《积极心理学视角的特殊教育教师情绪劳动策略研究》,《教师教育研究》2016年第1期。

③ Pugliesi, K. *The consequences of emotional labor in a complex organization*. *Motivation and emotion*, 1999, 23(2), 125-154.

④ Koeske, G. F., & Koeske, R. D. *A preliminary test of a stress-strain-outcome model for reconceptualizing the burnout phenomenon*. *Journal of Social Service Research*, 1993, 17, 107-135.

⑤ Cheung, Y. L., & Cheung, R. Y. *Effect of emotional dissonance on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Testing the stressor-strain-outcome model*. *The Journal of Psychology*, 2013, 147, 89-103.

⑥ Greenhaus, J. H., Beutell, N. J. *Sources of conflict between work and family rol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5, 10(1), 76-88.

⑦ Frone, M. R., Yardley, J. K., & Markel, K. S. *Developing and testing an integrative model of the work-family interface*.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1997, 50, 145-167.

压力源,而后者更多是一种对家庭领域中压力源的反应^①。鉴于情绪劳动是一种工作场所中的压力源,本文主要探索工作对家庭冲突在情绪劳动和心理健康间的中介效用,并借助于资源保存理论来理解。根据资源保存理论,资源是个体所重视的事物,如物体、身份或精力等,而这种资源对个体来说是有限的,因此,个体将努力获取或保留资源,并尽力阻止个体资源的流失;在面临资源丧失或威胁时,个体将会感受到压力^②。同时,资源保存理论表明,与资源富足的个体相比,资源缺乏的个体更易受到压力源的影响^③。一方面,情绪劳动的付出将损耗个人资源。为防止个人资源流失,情绪劳动付出者将采取相应策略来守护其个人资源。考虑到个人绩效评估、职业晋升等因素,特殊教育教师往往难以减少在工作中的资源投入。因此,为保护个人资源的平衡,减少家庭领域的资源投入常成为特殊教育教师迫不得已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情绪劳动将导致工作对家庭的冲突。例如,帮助身心残障儿童获得自尊和自信心(即情绪增强),往往会消耗教师们较多的情绪资源,这将导致他们下班回家后缺乏情绪资源去关爱家人,如表现为对家人的冷漠。另一方面,工作对家庭冲突的出现,意味着个人往往缺乏个人资源(如精力和注意力)来平衡工作和家庭的矛盾,并有可能带来焦虑、烦躁等心理问题。相关研究已表明,工作对家庭冲突可导致员工主观幸福感、失眠和抑郁等心理不健康状态^④。根据上述分析,情绪劳动(压力源)导致工作对家庭冲突(紧张)而这种紧张将影响心理健康(结果)。为此,基于S-S-O模型,本文认为,工作对家庭冲突在情绪劳动和心理健康间起中介作用。

工作对家庭冲突中介下情绪劳动与心理健康的间接关系可能会受到个人特质差异性的影响。作为一类心理特质变量,核心自我评价(core-self evaluation)是指个体对自我能力和价值所持有的最基本的评价^⑤。通常,高核心自我评价者会较为积极地评价自我,认为可以掌控自己生活;低核心自我评价者则倾向低估自我价值,并常把失败归为客观原因。Kammeyer-Mueller等指出,从差别化反应角度看,作为一类个人特质差异化因素,核心自我评价能够成为应对紧张的调节变量^⑥。面对工作对家庭冲突时,高核心自我评价者相信自己有足够资源(如能力、信心)来应对这种冲突,从而较少出现焦虑、自卑或自我否定等现象;相反,低核心自我评价者倾向将工作对家庭冲突视为一种难以克服的困难,从而变得相对悲观、情绪低落,面临较为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综上所述,核心自我评价水平的提升能够缓解工作对家庭冲突对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同时,鉴于前文关于工作对家庭冲突中介作用的假设,本文进一步推测,核心自我评价调节着情绪劳动通过工作对家庭冲突对心理健康的间接影响。

当前,国内关于情绪劳动对心理健康影响的研究局限在于,研究多从自我关注层面来展开情绪劳动(如深层扮演)的影响研究而缺少他人关注层面的情绪劳动(如情绪增强)影响研究,研究内容多为直接关系而缺少影响机理,研究对象多为普教教师而缺少特教教师,研究方法多为横断而缺少纵向研究。本研究以特殊教育教师为对象,采用纵向方法,对其情绪劳动通过工作对家庭冲突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机理进行探讨,并将核心自我评价这一心理变量引入到研究中,这对于特殊教育教师心理健康的改善和特殊教育事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基于上文分析,本文构建出一个二阶段调节的中

① Byron, K. A meta-analytic review of work family conflict and its antecedents.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2005, 67, 169-198.

② Hobfoll, S. E.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A new attempt at conceptualizing stress.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89, 44, 513-24.

③ Hobfoll, S. E., & Shirom, A.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theory: Applications to stress and management in the workplace. *Public Policy & Administration*, 2001, 87, 57-80.

④ Ng, T. W. H., & Feldman, D. C. Embeddedness and well-be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ingapore: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work-to-family and family-to-work conflict.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Health Psychology*, 2014, 19, 360-375.

⑤ Judge, T. A., Locke, E. A., & Durham, C. C. The dispositional causes of job satisfaction: A core evaluations approach.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1997, 19, 151-188.

⑥ Kammeyer-Mueller, J. D., Judge, T. A., & Scott, B. A. The role of core self-evaluations in the coping proces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09, 94 (1), 177-195.

介模型(见图1),并有如下假设:(1)情绪劳动对工作对家庭冲突具有显著正向影响;(2)工作对家庭冲突在情绪劳动和心理健康间具有中介作用;(3)核心自我评价调节工作对家庭冲突对心理健康的直接影响,从而调节情绪劳动对心理健康的间接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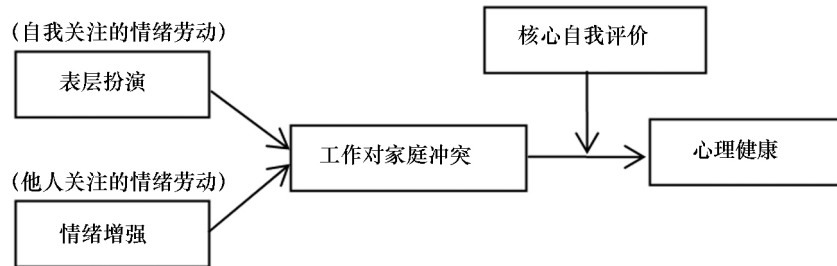


图1 二阶段调节的中介模型

二、数据与方法

(一) 样本与数据

本研究选取上海、安徽两地的四家特殊教育机构发放问卷,问卷分三个阶段(即 T_1 、 T_2 和 T_3),各相隔两周。后一阶段问卷将只针对前一阶段问卷有效回收的人群进行发放。例如, T_2 问卷仅发放给 T_1 问卷有效回收的人群。所有问卷进行编码,以保证问卷的匿名性和匹配性。 T_1 问卷主要测量表层扮演、情绪增强和人口变量,问卷发放量170份,有效回收163份。两周后,测量工作-家庭冲突的 T_2 问卷发放,有效问卷160份。测量心理健康与核心自我评价的 T_3 问卷在 T_2 问卷回收两周后发放,有效问卷158份。在最终158份有效样本中,女性占56%,已婚占78%,平均年龄在37.26岁($SD=0.42$)。

(二) 研究工具

自我关注的情绪劳动量表,我们采用Kruml和Geddes^①开发的情绪劳动量表中表层扮演部分,共3个测项,如“当和学生接触时,我需要掩饰我的情绪”。量表5点计分,从“1=从不”到“5=总是”。

他人关注的情绪劳动即情绪增强的量表,我们采用Seery等^②开发、有3个测项的量表,如“我的部分工作是使学生们感觉到快乐”。量表5点计分,从“1=从不”到“5=总是”。

工作-家庭冲突量表,我们采用Kopelman等^③编制的量表,共8个测项,如“下班后,我回到家往往累得没劲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量表5点计分,从“1=非常不同意”到“5=非常同意”。

心理健康量表,我们采用Chan^④的一般健康问卷(GHQ),共12个测项,如“我有由于过分担心而出现过失眠的情况”。量表4点计分,从“1=一点也不”至“4=比平时多得多”。相关项目反向记分后,得分越高表明心理健康状况越好。

① Kruml S. M. & Geddes J. Exploring the dimensions of emotional labor: The heart of Hochschild's work. *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000, 14 (8) - 19.

② Seery, B. L., Corrigan, E. A., & Harpel, T. J. Job-related emotional labor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work-family conflict and facilitation. *Journal of Family & Economic Issues*, 2008, 29 (3), 461-477.

③ Kopelman, R. E., Greenhaus, J. H., & Connolly, T. F. A model of work, family, and interrole conflict: A construct validation study.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 Human Performance*, 1983, 32 (83), 198-215.

④ Chan, D. W.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general health questionnaire: Does language make a difference? *Psychological Medicine*, 1985, 15 (1): 147-155.

核心自我评价量表,我们采用 Judge 等^①开发的含有 12 个测项的量表,如“只要我去做,我通常都能成功”。量表 5 点计分,从“1 = 非常不同意”到“5 = 非常同意”。

(三) 假设检验方法

本研究将使用多元层次回归分析来检验假设 1,使用 Hayes' PROCESS 工具(2013)^②和 bootstrapping 分析方法来检验假设 2(中介效用)和假设 3(调节的中介)。统计分析工具为 SPSS21.0(含 AMOS 模块和 PROCESS 插件)。

三、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一) 量表的信效度分析

Cronbach's α 值用来判别本研究中各量表的信度。表 1 表明,表层扮演等五个量表的 Cronbach's α 值均大于 0.7,说明各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内部一致性较好。同时,为考察各量表的区分效度,本研究进行一个五因子模型的验证性因子分析(CFA)。一般而言, $X^2/df < 4$,CFI、IFI 取值大于 0.90, RMSEA 低于 0.08,说明模型拟合较好^③。本研究 CFA 结果($X^2 = 1228.09$; $X^2/df = 1.875$; RMSEA = 0.074; IFI = 0.910; CFI = 0.907)表明,五因子模型拟合度较好,研究各变量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二)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在考虑性别、年龄、婚姻这三个控制变量的影响下,本文对各变量及其相关关系进行描述分析。从表 1 可知,主要研究变量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例如,表层扮演与工作对家庭冲突显著正相关($r = 0.37$, $p < 0.01$),工作对家庭冲突与心理健康显著负相关($r = -0.28$, $p < 0.01$),这为进一步检验工作对家庭冲突的中介作用奠定了基础。

表 1 模型自变量的 Mean, SD 和 Person 相关分析

	Mean	SD	1	2	3	4	5	6	7	8	Cronbach's α
1. 性别	0.44	0.50	1								—
2. 年龄	37.26	9.30	-0.19*	1							—
3. 婚姻	0.78	0.42	-0.07	0.47**	1						—
4. 表层扮演(T_1)	3.30	0.66	0.00	0.03	0.01	1					0.81
5. 情绪增强(T_1)	3.41	0.63	-0.06	-0.07	0.10	0.64**	1				0.77
6. 工作对家庭冲突(T_2)	3.14	0.76	0.04	-0.06	0.02	0.37**	0.39**	1			0.95
7. 核心自我评价(T_3)	3.28	0.63	0.02	-0.09	-0.09	-0.08	-0.14	-0.07	1		0.95
8. 心理健康(T_3)	2.78	0.52	-0.02	0.10	-0.04	-0.16*	-0.17*	-0.28**	0.25**	1	0.93

注: $N = 158$; * $p < 0.05$; ** $p < 0.01$ 。

(三) 直接和中介效应检验

表 2 的模型一显示,在控制性别等变量的情况下,表层扮演和情绪增强均正向显著预测工作对家庭冲突(表层扮演: $B = 0.24$, $p < 0.05$; 情绪增加: $B = 0.31$, $p < 0.01$)。因此,假设 1 得到验证。表 2 的模型二显示,在控制表层扮演和情绪增强这两类情绪劳动变量后,工作对家庭冲突负向显著性预测心理健康($B = -0.17$, $p < 0.01$)。基于 MacKinnon 等^④的观点,当情绪劳动对工作对家庭冲突

① Judge, T. A., Erez, A., Bono, J. E., & Thoresen, C. J. The Core Self-Evaluations Scale (CSES): Development of a measure. *Personnel Psychology*, 2003, 56, 303-331.

② Hayes, A. F. *Introduction to Mediation, Moderation, and Conditional Process Analysis*.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2013.

③ 侯杰泰,温忠麟,成子娟《结构方程模型及其应用》,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2-17页。

④ MacKinnon, D. P., Fairchild, A. J., & Fritz, M. S. Mediation analysi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2007, 58, 593-614.

的直接影响以及工作家庭冲突对心理健康的直接影响均有显著性时,工作家庭冲突的中介效应实际上已获得了部分支持。为了进一步验证工作对家庭冲突的中介效应,本研究借助于 Hayes' PROCESS 模块 [①]进行 bootstrapping 分析。表 2 显示,(基于工作对家庭冲突的中介)表层扮演对心理健康的间接影响具有显著性 (Estimate = -0.07, 95% CI = 0.14, 0.02); 同时,(基于工作对家庭冲突的中介)情感增强对心理健康的间接影响也具有显著性 (Estimate = -0.08, 95% CI = 0.15, 0.03)。根据上述结果,假设 2 得到支持。同时,Bootstrapping 分析下的直接效应结果表明(见表 2),工作对家庭冲突为控制变量时,表层扮演对心理健康的直接影响不具显著性 (Estimate = -0.06, 95% CI = -0.18, 0.07),情绪增强对心理健康的直接影响也不具显著性 (Estimate = -0.03, 95% CI = -0.17, 0.10)。因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得出,工作对家庭冲突在情绪劳动和心理健康中起完全中介作用。

表 2 直接和中介效应分析

	模型一:工作对家庭冲突		模型二:心理健康	
	B(SE)		B(SE)	
性别	0.07(0.11)		0.01(0.08)	
年龄	0.00(0.01)		0.01(0.01)	
婚姻	0.03(0.15)		-0.12(0.11)	
表层扮演	0.24(0.11)*		-0.05(0.08)	
情绪增强	0.31(0.12)**		-0.01(0.09)	
工作对家庭冲突			-0.17(0.06)**	
R^2	0.05**		0.10**	
工作对家庭冲突的中介效用				
间接效应(Bootstrapping 分析法)				
表层扮演 → 工作对家庭冲突 → 心理健康	Estimate	SE	95% CI	
	-0.07	0.03	(0.14 0.02)	
情绪增强 → 工作对家庭冲突 → 心理健康	-0.08	0.03	(0.15 0.03)	
直接效应(Bootstrapping 分析法)				
表层扮演 → 心理健康(工作对家庭冲突为控制变量)	Estimate	SE	95% CI	
	-0.06	0.06	(-0.18 0.07)	
情绪增强 → 心理健康(工作对家庭冲突为控制变量)	-0.03	0.06	(-0.17 0.10)	

注: $N = 158$; * $p < 0.05$; ** $p < 0.01$; CI, 置信区间 (Confidence Interval); Bootstrap 样本规模 = 5000。

(四) 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表 3 显示,工作对家庭冲突和核心自我评价的交互作用对心理健康具有正向显著影响 ($B = 0.11, p < 0.01$),并且相比较模型一,模型二的 R^2 增加了 4% (0.15 到 0.19),这说明核心自我评价在工作对家庭冲突和心理健康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显著,且为缓解效应。为了进一步验证假设 3 所提出的调节的中介模型,本研究就核心自我评价(高和低)不同水平下情绪劳动对心理健康有条件的间接影响进行 bootstrapping 分析。根据 Preacher 等 [②] 建议,本研究取高于或低于均值的一个标准差为调节变量的高值或低值。表 3 结果表明,在低核心自我评价下,(工作对家庭冲突为中介)表层扮演对心理健康的间接影响具有显著性 (Estimate = -0.15, 95% CI = -0.25, -0.08),但在高核心自我评价下这种间接影响变弱且不具显著性 (Estimate = -0.03, 95% CI = -0.10, 0.02)。同时,在低核心自我评价下,(工作对家庭冲突为中介)情绪增强对心理健康的间接影响具有显著性 (Estimate = -0.16, 95% CI = -0.27, -0.09),但在高核心自我评价下这种间接影响变弱且不具显著性 (Estimate = -0.03, 95% CI = -0.11, 0.03)。因此,假设 3 得到支持,即说明:核心自我评价

① Hayes, A. F. Introduction to Mediation, Moderation, and Conditional Process Analysis.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2013.

② Preacher, K. J., Rucker, D. D., & Hayes, A. F. Addressing moderated mediation hypotheses: Theory, methods and prescriptions. Multivariate Behavioral Research, 2007, 42, 185-227.

越高,情绪劳动(表层扮演和情绪增强)通过工作对家庭冲突对特殊教育教师心理健康的间接影响也会变得越弱。

表3 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

	模型一		模型二	
	心理健康 B(SE)		心理健康 B(SE)	
性别	0.01(0.04)		0.00(0.04)	
年龄	-0.08(0.05)		-0.05(0.05)	
婚姻	-0.05(0.05)		-0.05(0.04)	
表层扮演	-0.04(0.05)		-0.03(0.05)	
情绪增强	0.01(0.05)		0.01(0.05)	
工作对家庭冲突	-0.13(0.04)**		-0.15(0.04)**	
核心自我评价	0.12(0.04)**		0.09(0.04)*	
工作对家庭冲突* 核心自我评价			0.11(0.04)**	
R^2	0.15**		0.19**	
情绪劳动对心理健康的间接影响 (核心自我评价为二阶段调节)				
	Estimate	SE	95% CI	
表层扮演	-1 SD(-0.66)	-0.15	(-0.25, -0.08)	
	+1 SD(+.66)	-0.03	(-0.10, 0.02)	
情绪增强	-1 SD(-0.63)	-0.16	(-0.27, -0.09)	
	+1 SD(+.63)	-0.03	(-0.11, 0.03)	
+1 SD(+0.63)	-0.03	0.03	(-0.11, 0.03)	

注: $N = 158$; * $p < 0.05$; ** $p < 0.01$; CI, 置信区间 (Confidence Interval); Bootstrap 样本规模 = 5000。

四、讨论

(一) 情绪劳动与工作对家庭冲突间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表层扮演和情绪增强均对工作对家庭冲突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说明:情绪劳动这种新型的工作压力源,对特殊教育教师家庭和生活领域具有负面的溢出性影响。特殊教育教师需要每天穿梭于工作与家庭两个相对独立的领域,承担着两个领域的多重角色。然而,个体所拥有的资源是有限的。当工作(家庭)领域的角色要求扩张时,其需要从家庭(工作)领域中调取资源^①。按照教育教学工作要求,特殊教育教师既需要面向特殊教育需要学生展现出与内心感受不一致的情感表达如笑容、热情等(即表层扮演),又要鼓励并帮助他们树立自信心和自尊(即情绪增加)。这种高强度的情绪劳动意味着教师们在工作中大量个体资源(如情绪资源)的付出。结果,在个体资源有限情况下,教师们只得从家庭领域中调取资源,从而导致工作侵扰家庭现象的出现。本研究支持了工作-家庭界面模型的基本观点:工作相关压力源即工作场所中能够带来潜在压力的情境或事物,往往会带来工作对家庭冲突^②。

(二) 工作对家庭冲突的中介作用

以往国内外研究主要关注了情绪劳动对心理健康的直接影响,但其影响机理仍存在着“黑箱”,并且研究也很少针对特殊教育教师这一类教育工作者。通过实证,本研究发现工作对家庭冲突在特殊

① Westman, M., Hobfoll, S. E., Chen, S., Davidson, O. B., & Laski, S. Organizational stress through the lens of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COR) theory. *Research in Occupational Stress and Well-being*, 2004, 4 (1), 167 - 220.

② Greenhaus, J. H., & Parasuraman, S. A work-nonwork interactive perspective of stress and its consequences.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Management*, 1987, 8 (2), 37 - 60.

教育教师情绪劳动(表层扮演和情绪增强)和心理健康间起中介作用。如前文所述,对于特殊教育教师而言,工作相关压力源即高强度情绪劳动的付出将会对家庭领域产生溢出影响,带来他们工作对家庭的冲突。与此同时,工作和家庭角色不相容情况的出现,将导致个体所拥有的社会资源被耗尽,从而导致个体负面心理感受的出现^①。一些研究已经表明,工作对家庭冲突将对员工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例如,O'Driscoll发现,工作侵扰家庭显著预测员工的心理紧张^②。因此,高强度情绪劳动的付出使得特殊教育教师面对工作侵扰家庭这种困境,而这种困境将对他们的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此研究结果给Koeske和Koeske^③的S-S-O模型提供了本土化的实证支持,即压力源(如情绪劳动)将带来紧张(如工作对家庭冲突),而紧张将影响结果(如心理健康)。可以说,本研究验证了S-S-O模型在揭示情绪劳动与心理健康间关系的重要价值。

(三) 核心自我评价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发现,核心自我评价调节情绪劳动通过工作对家庭冲突对心理健康的间接影响,并表现为缓解效应。这表明核心自我评价能够有效降低情绪劳动对特殊教育教师心理健康的间接损害。相比较低核心自我评价者,高核心自我评价者面对情绪劳动这种人际压力源所带来的工作对家庭冲突时,能够表现出更强的自信,积极地评价自己并认为自己有能力来应对工作对家庭冲突。因此,在付出较高的情绪劳动并因此遭遇工作对家庭冲突时,高核心自我评价者较少出现焦虑、心理紧张等心理健康问题。总体上,本文关于核心自我评价在情绪劳动对心理健康间接影响所呈现出的正向缓冲作用的论证结果,与以往有关核心自我评价的研究较为一致,并表明:核心自我评价作为一个个体心理特质,能够影响特殊教育教师面对情绪劳动所带来的工作家庭冲突的处置能力,从而缓解情绪劳动对心理健康带来的间接性负面影响。通过中介的调节模型的建构,本文将核心自我评价作为调节变量引入研究框架,这不仅符合特殊教育教师现实的工作情况,也给特殊教育教师情绪劳动和心理健康间关系的理解提供了新的视角。

五、管理建议

本研究给我们提供了如下启示:第一,情绪劳动对工作对家庭冲突的直接影响和心理健康的间接影响均表明,学校管理者应重视情绪劳动给特殊教育工作者心理带来的负面破坏性结果。为此,教育管理部门和具体学校需要给予特殊教育教师相应的人文关怀和心理援助,并将情绪劳动纳入学校人事管理制度中。例如,将情绪劳动付出在特殊教育教师绩效评估和薪酬中得到体现;关注由于强情绪劳动给特殊教育教师带来的家庭侵扰和心理问题,实施相应的教师家庭或心理援助计划。第二,鉴于工作对家庭冲突的中介作用,学校管理者应采取积极措施促进特殊教育教师工作和家庭的平衡,以降低情绪劳动这种工作压力通过对家庭领域的负面溢出而给他们心理健康带来的间接性破坏。为此,学校可以面向特殊教育教师制定专门的家庭友好政策,实施弹性工作时间、缩短工作时间、灵活休假等。第三,核心自我价值在情绪劳动对心理健康间接影响中的缓冲作用,为学校管理者帮助特殊教育教师

(下转第159页)

① Greenhaus, J. H., & Beutell, N. J. Sources of conflict between work and family rol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5, 10 (1), 76-88.

② O'Driscoll, M. P., Ilgen, D. R., & Hildreth, K. Time devoted to job and off-job activities, inter-role conflict, and affective experience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992, 77 (3), 272-279.

③ Koeske, G. F., & Koeske, R. D. A preliminary test of a stress-strain-outcome model for reconceptualizing the burnout phenomenon. *Journal of Social Service Research*, 1993, 17, 107-135.

面? 这仍有待将来进一步研究。第二, 由于描述性研究自身的局限性, 学生在认知以及情感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一系列差异难以排除动机类型之外的其他因素的影响, 因此, 未来研究可考虑采用实验方法以确定因果关系。第三, 本研究对象仅局限于高一学生, 但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 由于身心成熟水平以及所处的学校环境的差异, 是否会导致各类动机在作用模式上表现出差异? 未来研究应将研究对象扩展至小学生、初中生, 甚至大学生, 以进一步明确各类动机的影响和作用模式。

五、结论

通过对实验结果的分析与讨论, 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 在学习策略上, 高学习动机型学生与内部动机为主型学生的得分最高, 显著高于低学习动机型学生和外部动机为主型学生。(2) 在学习焦虑上, 外部动机为主型的学生得分最高, 显著高于其他三类学生; 高学习动机型学生的得分次之, 显著高于内部动机为主型的学生; 内部动机为主型学生的得分最低, 但与低内部动机型学生不存在显著差异。(3) 综上, 内部动机为主型学生可能具有最积极的学习反应模式, 高学习动机型和低学习动机型学生都具有一些非适应性特征, 外部动机为主型学生的消极学习反应明显。学校教育也应关注学生学习动机的质。

(责任编辑: 丁 翔)

(上接第 153 页)

应对情绪劳动及工作对家庭冲突提供了针对性的管理思路。一方面, 从员工胜任视角, 特殊教育机构需要招聘那些具有应对工作压力和紧张的个人特质即高核心自我评价的教师, 这是因为特殊教育岗位有着较重的情绪劳动要求, 而核心自我价值水平低下的教师往往缺乏自信和能力, 难以应对情绪劳动所带来的工作家庭冲突问题, 从而会出现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另一方面, 学校管理者可以采取相关措施如专门性的教师心智培训、对个人教育教学贡献的积极肯定等, 以提高在岗特殊教育教师的核心自我评价水平, 使他们在工作中变得更为自信, 从而增强其应对高情绪劳动及所带来的工作侵扰家庭的能力。

(责任编辑: 丁 翔)

tem. Through the reform , the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became more harmonious , and the threat factors of the military authoritarian on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were basically eliminated. In this period , it is also the important period for the military to seek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st countries in Latin America. The function transformation of the military forces in Argentina was a typical event , which formed an important radiation effect on other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Emotional Labor on Psychological Health among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s: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Longitudinal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ZHANG Ran , YE Chao

Abstract: In a sample of 158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s , and through a longitudinal study , the present study tested a second-stage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of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emotional labor (EL) , namely the self-focused one (i. e. Surface acting) and the other focused one (i. e. Emotional enhancement) on psychological health. The results indicate: (1) EL is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predictive of work-to-family conflict (WFC) ; (2) WFC fully mediates the EL - psychological health relationship; (3) Both the direct effects of WFC on psychological health and the indirect effects of EL on psychological health via WFC , were buffered among the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s of high core self-evaluation.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Academic Adaptability of Profiles of Intrinsic and Extrinsic Motivations

LUO Li-fang , Zhu Jun-ping

Abstract: In this study , a total of 209 high school students were divided into four groups: a high quantity motivation group , a low quantity motivation group , a primarily intrinsic motivation group and a primarily extrinsic motivation group. The scores of their learning strategies and anxiety were compared to examine the academic functioning of different types of motivation. Higher level of learning strategies was found for the students in the primarily intrinsic and high quantity groups than that of the students in the other two groups. In addition , the primarily extrinsic group reported the highest level of learning anxiety , and the high quantity group reported more learning anxiety than did the primarily intrinsic group.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primarily intrinsic motivation seems to yield more learning benefits. For this , the educators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quality” of students’ motivation.

Know Yourself: A Review of Related Studies on Self-Construction

ZHENG Zhi-guo , LIU Jian-ping

Abstract: Self construction is a cognitive structure that represents self and organizes information about the individual in relational to others. It has very important influence on people’s cognition , emotion , motivation and behavior. Based on systematic review of self-construal’s related factors ,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indigenous studies in self construction , pointed out the defect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urrent self construction research , and indicated the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